

哲学的叩问译丛

主编 / 史忠义
张龙海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书系

论问题学：

哲学、科学和语言

De la problématique
Philosophie, science et langage

[比] 米歇尔·梅耶◎著
史忠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N02
293

014041648

哲学的叩问译丛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书系

论问题学：

哲学、科学和语言

De la problématique
Philosophie, science et langage

[比] 米歇尔·梅耶◎著
史忠义◎译

主编 / 史忠义
张龙海



北航

C172479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N02
293

图登字: 01 - 2013 - 32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问题学:哲学、科学和语言/[比]梅耶著;史忠义主编;史忠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4

(哲学的叩问译丛)

ISBN 978 - 7 - 5161 - 3951 - 6

I. ①论… II. ①梅…②史…③史… III. ①科学哲学—研究
IV. ①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660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75
插 页 2
字 数 323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et l'aide de l'Ambassade française en Chine qui méritent d'être vivement remerciés
par éditeur et traducteur du présent ouvrage.

本书出版承蒙法国外交部和法国驻华使馆赞助，特此致谢！

De la problématique

Philosophie, science et langage

Par Michel Meyer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8

“四部丛刊版”序

问题学在成为一种哲学思想之前，首先是一部著作的名称：我们下面将要阅读的就是它的再版。这部著作在“大作”丛书中的重印将褒奖它在这种新思想的传播中所发挥的奠基作用，这种新思想在岁月的线条中确立为某种第三条道路，它的一侧是虚无主义和解构论，另一侧是分析哲学和唯科学主义。

到底什么是问题学呢？它是把各种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对它们的思考置于人类活动之核心和基础地位的思想观。它同样卓越地把日常性与哲理性、实践与理论、存在性与历史性耦合在一起。真实并不自然给予，它要通过叩问，而这种情况不管是对科学还是对道德或政治学，一概有效。只有当人们头脑里有了某种问题时，他们才说话和思考。哲学的特性在于以彻底的方式叩问。不应该青睐回答，诚然，它们是人们唯独看到和言说的素材，不管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生活实践中皆如此。在那里，各种问题一旦得到解决，人们就把它搁置一旁。这种现象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即在思想的建树中，问题不是基本的要素，而实际上它们却是头等重要的要素。

哲学思考不仅仅是提出问题，而是变成了对提问这种现象本身的叩问，以期上溯到我们最深刻之本质的根基本身。是否存在一种能够表达叩问并把它与回答相分离的特有的语言呢？如何在艺术中、科学中、文学中，或者简而言之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中，并进而在日常的存在中发现（标示）这种语言呢？这是哲学的重大关注之一，而只有拥有某种真正的叩问理论时，上述关注才能获得进展，这种理论不再以各种毁灭叩问的回答为核心，就像人们一以贯之所做的那样，而是以那些维持叩问开放状态的回

答为核心。这样，我们就从不区分问题与回答之差异属性的命题时代过渡到了就回答概念的定义而言，反馈到问题的回答时代。因此，就存在着问题学意义上的回答，它们反映了某种叩问，和其他可以谓之曰非批评性（apocritiques）的回答，后者关闭叩问。科学只看见后者，这很正常，因为这是它的探索目的，然而直至现在如出一辙的哲学，因而必然处于某种对立状态，考虑到它们各自的成果，哲学要走出上述对立状态，就只能失去哲学的色彩。哲学把自己的种种问题化等同于解决方案，这种宣称大概是错误的，这里的解决方案取人们通常使用的词义。即使这是一些答案，它们仍然有一些特殊。如今，由于问题学，我们可以结束这种二元对立状态，结束这种简化状态，通过建立种种不同的和特别的回答，它们在表达问题时并不吞没它们，似乎魔棍一动就给出了答案。

以前的哲学领域之所以没有采用这种方法，大概是因为，表面上似乎最成立的各种价值、基石、回答都没有达到这种问题性的程度。如今人们再也回避不了这种问题性。因此，应该能够这样思考它，即不再把问题性压缩到习以为常的回答中，并从修辞学角度排空问题性。那些简单的解决方案的思想也应该结束了，它们从深层次反映了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近乎科学性或宗教意义上的可靠性的需要。存在着某种此岸，那是哲理性的场域，在这种场域里，各种问题都展开了，然后又经常归于消失。然而，正是任何解决方法中实际存在的这种潜在的问题域，应该成为哲学回答研究的对象。尽可能把叩问理论化，并考察对这种新基础的凸显能达到何种程度，今后将引导着我们。直至今日，人们从来不曾怀疑过他们的基础。这正是这部书稿提出的挑战。

米歇尔·梅耶

布鲁塞尔，2008年6月

卷首语

为什么今天就要叩问提问呢？在今天哲学所遭受的危机中，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种方法论呢？作为人们持续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笛卡尔对活动机的这些问题，且莫说像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这些当代哲学家，是我称之为问题学的这种思想的构成部分，而问题学不是别的，它是对叩问的研究。这种研究从与传统的这种对话中脱颖而出，它是思考性的必然，是哲理性与历史性之关系中哲理性的实证。

然而，也由于这种哲理性的实证本身，这部著作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是对一项更带根本性的任务的准备，后者在于从彻底的叩问性出发把它自身耦合起来，以便触及思想原则的体系性。因为，一旦人们接受叩问是回避不了的，那么就需要弄清楚叩问如何进入并建构这种理性。

这就是说，这部著作既雄心勃勃，又必然贡献微薄。雄心勃勃，因为这是通过某种新方法超越某种不可能性的危机；贡献微薄，因为它主要还是提供了对传统及其疑难的某种分析，即使涉及科学路径和语言时，问题学是建树性的，因为其中提出了这种双重耦合的一种哲学理论。

导 语

哲学的性质

这是一部经典意义上的哲学书籍。对此，应该理解为大传统意义上对基本精神的探索，理解为彻底的叩问。正如笛卡尔（Descartes）对那些可能遗忘了他们的祖宗亚里士多德（Aristote）的人们提醒说，“所谓真正的哲学”，乃是“探索这些最初的原因，即种种原理……而我以为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东西不获得所有博学者的一致意见”。

但是，大家且莫误解，因为那种类型的哲学已经失传了。历史的冲击把种种个人方案的荒诞性推向前台，它们热衷于怀疑这位所谓奠基人的各种言语，另外这些言语太经常潜意识地或受各种利益的驱动而出现。那么，自笛卡尔以来哲学赖以生存的主体就死亡了，其后果是，学者们的兴趣从此转向他的语言和他的种种言语。这就是我们时代知识领域的两大特点，它完善了20世纪由尼采（Nietzsche）、马克思（Marx）和弗洛伊德（Freud）开创的对主体去本质化的活动。

这样，哲学就与加速前进、愈来愈不稳定的历史联姻了，以至于把自己的演进节奏建立在时尚和时兴的效果之上。这就是赫斯（Hesse）在《玻璃珍珠的游戏》（*Le Jeu des perles de verre*）中所描述的“片断时代”。思想最终迎合了离散性、短暂性，从以前的古老沙龙过渡到现在的大厅，由于听众规模而变得必要的各种媒体的鼓噪，民主派的精英们重新聚会在这类大厅里。然而，哲学放弃了它自身，让位于言辞的肤浅和严谨的缺失，严谨的缺失允许最晦涩的文字游戏畅行无阻。必然如此，因为不再有哲学路径的基石能够引导它，不管是在它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中，还是在它所提供的种种回答中。毫无疑问，笛卡尔之后，人们很少把重心集中在原理的探索上，因为思想恰恰建立在自我意识的笛卡尔起点上。然而，康德

(Kant) 的贡献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紧随其后的他的继承者费希特(Fichte),为了更好地确立康德的贡献,仍然投入对这种新观察方式之基础的某种探索。

如今,随着奠基者的死亡,事情变得不同了。倘若不重新遵循基础路径,就不再可能进行哲学思考,因为要赋予自己一种哲学基础。就其深层而言,当今哲学的碎片化方式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不是主导原则的缺失所导致的人们不再知道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如何严谨地解决它们还能有什么呢?从此,每个人对他很想的事情感兴趣,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谈论它,并因而寻找今后唯独可以掌控的担保:广大公众的支持,得不到公众支持时,或者转而寻求大学的支持,后者经常缺少对哲学记忆的丰富,但保留着哲学记忆。因为所谓严谨的哲学没有其他出路,只能躲进过去体验的孤独性中,沉潜于纯粹的哲学史写作。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沉潜只能获得与上述态度同样的结果,即过去一贯、未来永远遵循统一和综合路径的哲学的分散和碎片化。每个人谈论“他的”作者,一个人“喜欢”莱布尼茨(Leibniz),另一个人则“爱好”洛克(Locke)或黑格尔(Hegel),似乎这些偏爱不需要得到论证,除非我们的专家因为自己教授他们的简单事实而认为他们是可以得到论证的。诚然,最低限度的严谨性因为伟大文本的存在而得以保证,然而为什么这些文本是伟大的,它们还向我们谈论了什么,我们应该自己研究它们并真正以它们为对象,似乎这个任务是显而易见的吗?难道不应该叩问它们,并根据我们努力解决的问题和向它们提出的问题(它们有可能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把它们向我们言说的东西耦合起来吗?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中的任意性就不再应该受到辩护。除非重新堕入下述思想,即人们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并仅仅因为面对其历史就可以“从事哲学工作”。于是人们就躲在解决方案建制化的背后,来论证提出有关它们的种种问题并非很有道理。

思想的碎片化是典型的反哲学的,尽管其外表相反,理由是,哲学的内在维度就肩负着体系化的使命。它回答各种混乱时期的方式,如果不是歪曲,那也不是作为这些时期的回声,而是尝试着赋予那些因为碎片和不连贯现象缺乏条理而无法宣称有意义的东西以意义。哲学上的不连贯是术语之间的某种矛盾。这有点下述味道,即哲学家们试图让我们相信,在某既定时代的某社会里,所有的结构相互独立地漂浮,它们之间没有普遍的理性,而是每次都受不同的内在规律的支配随兴而动。

简言之，躲进哲学史里并不能代替哲学，尽管哲学不能不参照自己的历史。各种文本叩问中的从属问题并由此开始的排列问题，它们的价值、真理，全都既需要讨论，也需要直接重构。总之，人们对思想史的基本关注不应该作为不思考的托辞，尽管与文本的关系可能提供幻觉，由此流露出时髦哲学所缺少的学院主义的严肃性，这种严肃性有可能激发我们相信，这是一种坚实的态度，因为人们相信它基本上是自足的。然而，如果我们深长思之，这种把哲学仅局限为哲学史的态度，是无法超越纯粹史的视角哲学地反映其自身的。更有甚者，如果我们想谨慎地表述哲学观念时，作为哲学史的哲学观只能自我反驳。其实，这种格式本身不属于哲学史。那么，如果我们不顾一切地将其具体化，这种路径究其实意味着什么呢？它仅意味着，某种原理是不存在的，找不到的，因而不必要去寻找这样的原理。更为严重的是，我已经说过，我们不再生活在某种后笛卡尔的情境里，在那种情境里，人们尚可以在可接受的种种基础上积累某种传统，这就论证了省去探索某种第一原理的合理性，还因为德国传统后来把费希特（Fichte）其人推为自己的笛卡尔（Descartes）。不管怎样，如何设立否定任何原理设定的主导原理呢？显然，如果设定这样的哲学思维还是哲学思维的话，我们就无法进行哲学思维。叩问一个作者反馈到外在于他的某种叩问的必然性，最好情况下是他本人确认外在于他的某种必然性；反过来，这就迫使人们确切地把叩问彻底化，迫使人们对其进行哲学思考时某种程度上将其客观化。

不管人们是否采纳相对于客体的某种历史化的方法，哲学思维永远都具化为叩问和问题化。因此，应该能够从其他问题中裁定需要提出的问题，并从应该放弃的各种肯定意见中辨认出各种回答来。我们想到了苏格拉底（Socrate），然而，这是哲学的一种持久关注。康德（Kant）的《纯粹理性批判》（*la 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扎根于同样的关注之中：“人类的理性，”康德在为第一版所写序言的一开始就说，“在其认识世界的某种类型中，即拥有充满它无法回避的种种问题这种独特的命运，因为它的性质本身使它们强加于它，而它却无法回答它们，因为它们完全超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警觉的读者将从问题的这种划分中，如同从建立在解释这种划分的某种解决标准的探索中一样，辨认出《纯粹理性批判》的根本性耦合，后者甚至支撑着该著作内在的多样性。我们出于同样的理由，在经验主义那里也发现了这种问题意识，即哲学的表面繁荣和争论更多的是

思想贫乏的一种标志，而非真正的丰富，理由是，它们意味着某种随意性，某种模糊状态，并迫使人们通过重新获得体系性而找回自我。在阅读《人性论》（*Traité de la nature humaine*）的导言时，颇有点当今形势被描述的感觉。“不需要掌握某种很深刻的知识，就能够发现当今各种科学的不完备性，门外围着许多人这件事本身以及他们听到的嘈杂和喧闹声，就可以判断出门内并非很和睦。没有任何东西不经过讨论，没有任何东西知识界人士没有不同意见。最平庸的问题也躲不过我们的意见分歧，而在那些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很难给出某种确定的结论。各种讨论此伏彼起地进行着，似乎只有不确定性。在所有这种躁动中，并非理性夺冠了，而是能言善语；而任何人永远都不应该失去在最奇谈怪论的学说中获得新支持者的希望，只要他足以机灵地用有利的色彩描绘它。胜利没有被挺矛弄剑的武装战士所夺取，而是被武装部队的军号、战鼓和音乐家们所获得。”阅读预示当今媒体哲学的这部文本，人们可能会以为，休谟（Hume）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试图通过对叩问提问，而赋予那些最平庸的问题以结论，但是这不能忘记了对于他和他的前辈们，讨论的起点仍然是同一主题，用他的术语表示，即“人性”。洛克（Locke）认为，根源在于知性层面，但是出于同样的因素：“我们不应该出于对某种普遍知识的单纯热爱，急于向我们自己和其他人提出其主题富有争执和令人困惑的种种问题，在这些主题方面，我们尚无这样的知性，意思是说，我们无法在精神上形成有关它们的任何清晰有致的感觉”。

如今，当作为阿基米德式根基及其经验主义的或康德式不同变体的纯粹自我的笛卡尔式自明性，因为主体的死亡而从此缺失时，如果我们希望达到弄清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如何把它们与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相区分，并揭示出重要的解决办法时，比较恰当的途径，就是对这样的叩问提问，不作其他迂回。

这似乎很好地构成了今后哲学自然而然的任务，但是，超越方法论方面的各种论证或者对历史变化的考虑，我们敢于肯定从中碰到了哲学的主要要求吗？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从视点和主观主义方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后者源自主体的死亡！）重蹈惯常言语的窠臼。倘若必须对叩问提问，那么应该有能力奠定这种路径，而非在其他从尊严方面相似的问题中和有悖于这一称谓的问题中肯定上述问题。

因此，最重要的在于首先叩问原理、本原、叩问最先提出的问题，然

后再步入某种具体的叩问。须知，在有关何谓首要问题的叩问中独占鳌头的，乃是通过一般问题而提出的叩问本身。这就是何以提问是思想本身的原理，是绝妙的哲学原则。为了从一开始就能够回答，因为这是我们的宗旨，应该能够回答起点本身，这一回答不管可以呈现何种风貌，都反馈到它所隐含的问题即提问本身。倘若它不能肯定提问的优先性，就不会有以这种面貌出现的第一回答。没有提问的优先性，它将变成某种矛盾而自毁作为第一回答的面貌，因为回答预设了即使它自诩为第一成分仍然无法肯定的某种东西。

哲学是彻底的叩问，因为它的第一主题是提问本身。希腊人如果想到了提问，他们本应该忠实于字面意义地把这种情况称作问题学，但是他们未能这样做，我们将观照其原因。

哲学变成了其他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拒绝了叩问，那是它的生动原则。对历史的简单检视告诉我们，提问从来都不是哲学固有的主题。然而，哲学倘若不能在其实践层面实施提问，就可能不会诞生，也不会延续至今。于是，我们看到了叩问现象的某种偏移，它没有成为主题，而是走向自身以外的其他东西。彻底提问自身的这种非主题化现象产生了哪些后果呢？

各种回答自视为命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各种问题中浮现出来的言语没有与它们关联起来思考，而是自身被独立考察，似乎它自身是独立存在的，并通过其自身给予研究，如果不是为着它自身而研究，各种回答的自我命名的后果是，这些回答反过来被作为命题；而真理乃是即将赋予它们的基本属性。解决的思想在我称之为思维之命题范式的冲击下呱呱落地了。所谓思维的命题范式应该理解为随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渐脱颖而出的处理种种命题的范式：在柏拉图那里呈现为某种辩证和科学相统一的关联，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分裂为一方面非科学和修辞领域的辩证法，另一方面是逻辑学。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共同点是，不管命题性关联在辩证法或逻辑学里处于弱势还是在逻辑学里处于强势，都属于论证范围，即后者建立并强化一命题的真理性。对论证的这种关注是仅从其自身活动的结果来自我界定的某种讨论性（discursivité，推论性）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自身活动融化于非本质性之中，行将过渡到沉默之中或者被界定为心理现象和主观现象。此后便是根据这样论证的结果来衡量言语，它从何处诞生以

及如何产生的，都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可以肯定它作为结果的东西，即在其自身的真实性中论证它，在使它成为自立存在的它的真实性中论证它。这就是我之所以谈论思维的命题性范式而没有谈论语言的命题性范式的原因所在。如今，人们逐渐把命题看作某种语言实体，或者严格地看作逻辑和语义实体。然而，这是有关语言的某种独立思考的成果，某种新近的尝试，从历史的角度讲，我们刚刚展示过，希腊人不可能经历过这种尝试。对他们而言，逻各斯是他们毫无区别地用来命名思维和言语的语词，因为置于论证标志下的命题范式，必然表达了给出种种必然属于约束性理由的能力。这样，哲学在能够区别于科学之前，先变成了科学。哲学对认识的关注和认识论的关注恰恰与作为理性范式的论证相关联。我们从柏拉图那里看得非常清楚，对他而言，科学已经无愧于通过逻辑学的某种特别方法之誉，逻辑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变成了三段论理论。

哲学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成为科学，它也没有真正地脱离科学。由此产生了形而上学或者亚里士多德那里的第一哲学这种“所追求科学”的暧昧定位。事实上，命题范式不加区分地把哲学和科学安置在论证范围内。这是哲学自身没有对彻底提问主题化的一个后果。而由于它在自我放弃、走向并非它自身的某种客体，以及它同时在叩问的实践层面和它的相关概念化层面被极端化，它仍然是这种提问，那么提问的对象必然被泛化。可以说，就是存在（是）。这就解释了哲学何以与科学相反，将把自己的客体观或存在观整体化，不是瞄准这个或那个具体物质，甚或瞄准某种类型之现象，而是瞄准物质的客观性、现象的现象化、现是之所是。这就是造成客体为客体或现象为现象、事物为事物的原因。但是，命题模式得以继续，因为它一直关乎论证，关乎“这就造成了，等等”。科学关注具体的个别物质，而形而上学关注一般物质，正如我们上文已经看到的那样，由于两者都有哲学属性，随之而来的便是，人们把形而上学称作第一哲学，因为从它那里衍生出来的科学因其区域本体论的身份而多少有别于它。因此，普遍本体论便是第一哲学了。然而，科学的规则适用于任何哲学，除非还像当时那种相反情况，元物理学还没有真正分离出来，而文艺复兴时期让不同、有时甚至让新生的对立明显呈现出来，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对立在我们这个世纪被极端化。如果我们把两者混合在一起，这种情况还发生在18世纪，那么就应该谈论第一哲学日益增长的不可能性。科学在前进，而（第一）哲学在原地踏步。然而自康德起，分裂的见解明显确立。哲学

问题逐渐被科学所吸纳，而其他问题将逐渐变成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它们从时间的黑夜起，就一直在它们的无解性中重复。

这样，科学与哲学的性质区别因后者明显的退却而变得更加尖锐，最终构成了问题。但是，一直无视自己作为问题学的哲学，未能按照另一模式进行思考，赋予自己的特殊性以公正，并恰恰允许它接受甚至偏爱更多表达问题性的另一种言语方式，而非每次都把它融化在取消它的解决方法之中。哲学提供了许多回答，如果我们切近观照它们，这些回答并非语言、科学亦即理性之命题模式意义上的回答。各种哲学问题不考虑它们置于实践及蕴涵的彻底性，转向它们自身之外的其他东西，并由此开始，把哲学确定为本体论，使之与科学对立起来，带来的后果众所周知。尽管如此，某种差异在支撑科学和哲学领域之叩问的观念化中发挥了作用。由于没有拥有赋予这种差异以公正的某种问题学，人们便看到这里和那里纷纷出现了种种命题，它们可能蕴涵着真理和谬误，可能与其他命题相对立和相比拟。但是，那里我们碰到了各种哲学体系所缺乏的科学的实证性和有效性。事实上，各种哲学体系反馈到某种通过种种命题而展开的问题化活动，这些命题拥有这样的特殊性，即它们是问题学逻辑的，这就是说，它们在表达问题化的同时又回答了它。回答和表达问题学逻辑的这种双重性质明显地显示出，构成一个问题，在哲学领域里即解决它，因为问题化是哲学言语的目的。由此开始，惊异于哲学把它那些问题恒久化就变得荒诞了，因为它正是在这种方式中回答它们。它由此而与科学相区别，一俟问题解决，科学就取消了问题。这是科学的弱点，却反而成就了哲学的丰富性。还有，哲学问题的构成中包含回答的事实很好地显示，哲学应该在某种问题化中提出它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问题化取消了作为回答的各种问题，同时又保留了它们。我们知道，不可能把问题与问题中带入的回答相分离，这就迫使哲学不能在它不预设任何东西的事实之外预设任何东西。无疑，这是经典的定义，我们可以在黑格尔（Hegel）那里原封不动地找到它，然而，我们已经能够在柏拉图那里看到作为思想最高要求的这种定义，追求某种非假设性原则，这就把哲学置于各种科学之上，例如置于几何学之上，它们只能从假设开始才可以动起来。

所有这一切都蕴涵着，哲学即是它自己的对象，它似乎一直都是这样，但是以迂回的方式，因为提问一直未能作为根本问题。因此，这种情况是间接实现的，通过本体论而非通过问题学。对它造成的后果是，哲学

不得不支持本不成立的与科学的某种竞争，这种竞争因为从回答的视点看两者不处于同一层面而更显荒唐。形而上学就这样被抛弃，随后或多或少地与哲学相分离，后者继续与科学相关联，科学也回答即解决各种问题。例如，康德就用哲学与科学的这种分离来反对某种形而上学，我们不妨这样说，他既拒绝了形而上学，同时又在不可避免地扎根于思维本性的提问中建立了形而上学。从两种论点相互蕴涵的角度讲，它们是旗鼓相当的。尽管如此，我们上文已经讲过，哲学愈来愈离不开第一哲学，因为后者根本上是形而上学的、原理性的，于是转向对其种种叩问的本体论化，以至于落入膨胀之中，后者如今等同于那些最变动不居的方式。由此产生了哲学的背离，由此产生了重新赋予它某种原则并摆脱其本体论化的必要性，认识到它的深层实质不仅仅是叩问，而是通过提问把叩问彻底化，如果我们不想让它变异为神秘的回答时。

当我们说，哲学应该是它自己的对象，这似乎有点荒诞，或者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思想时，有点古老。我们这里的话语的意指是极其具体的，我敢相信，也是极其清晰的。其实质不是要捍卫这样的论点，即哲学应该通过不断地询问它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然后把这种路径作为思考的正面内容而空转。我想表达的东西更直接。哲学是它自己在其存在和其可能性本身中的问题。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这是一种历史的真实。由于这种事实，它应该叩问问题化的资源，以便把它们应用于自身。思想是其自身的问题，这是一种历史的发现，应该理解到这一点：那么，叩问哲学就变成了把自己的注意力哲学地亦即彻底地、不带预设地集中在问题化上。哲学地意味着我们不会止步于简单的叩问问题，因为它反映了思想界的当今困局，而是为它而提出它，并从它开始而展开回答。这里需要弄清楚的，是看这样一种叩问是否是原理性的、奠基性的。这样，我们就从历史层面过渡到最严谨的形而上学层面，这就反过来赋予哲学自身存在某种很确切的价值：在感知哲学之基本性要求的历史形态之后，重新思考哲学性这种要求的双重价值。

倘若四散分布的主题化导致哲学失去了自己的根基时，我们应该说它直至今日一直在彷徨并且误入歧途吗？事实上，这既不是忘却，也不是彷徨，而是历史的不可能性。过去的各种哲学不是种种错误，一个很好的理由是，各种问题的性质不是瞄准自我思考，而是瞄准自我解决，不是瞄准自我探索，而是导向解决方案。因此，解决方案并不自称为解决方案，而

是说这就是解决的方法，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问题消失于回答之中，后者并不自称为回答，而是肯定它将表述的东西，但又不说肯定它。很正常的情况是，回答不提自己是回答，并由此而不想反馈到某个任意问题，哪怕这是一个彻底的问题，意即它提出了作为问题的彻底性的问题。

回答当然要肯定它自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肯定使它成为回答的它的根基。哲学因为没有思考提问，只是把自我肯定作为回答行为，并由此而成为不知道它是回答的回答行为。哲学独特性的创造性区分来自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回答这一事实，因而问题不会穷尽，而且它会再次提出以促使其他解决方案的诞生，以此类推。这样一种结构的可能性在于哲学回答行为的问题学属性：它把已经被叩问的东西放进回答中，而已经被叩问的东西因为曾经被叩问过，便融化在某种问题学的回答行为中。这种问题学的回答行为当然是问题化了，它像任何问题一样，不会只有唯一的回答。一个哲学问题（“何谓自由？”）建构的多元性与权利的多重体系相关，在权利中，问题被提出并被观念化；同时它又是被界定的，它被置身于其中的体系本身所解决。例如，自由问题在康德那里和在马克思（Marx）那里提出的方式不同，意思是说，自由在他们那里以不同的方式成为问题，因为两种哲学的每一种都以自己的方式切近自由，并借助自己内在的观念体系的光明来观照自由，即处理位于问题之中的自由。哲学的问题化必然是全部（整体）视野的，并由此而内在于它自身，因为它是问题学回答行为的缘故，即围绕自身而把问题与回答差异化。自身承载着被建议、被喻示的某种差异化的问题化，就这样回答它所提出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和康德——我们重提这个例子——赋予他们各自所建构的自由问题的原貌某种解决方法，但是他们却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恰恰因为这种回答行为是纯粹问题学兼逻辑性质的。

与其他类型的回答不同，出于对希腊回忆的关心，我把这些类型的回答称为非批评性的（*apocritiques*）回答，它们化解并取消问题。如果说我们在哲学领域能够发现各种问题不绝如缕，人们应该得出某种根本性的失常、某种内在性失败的见证使得哲学徒有虚名的结论，即使我们感觉到它在存在方面的必要性吗？根据问题学的路径，回答明显是否定性的。在各种回答里，如同在科学中一样，既没有渐进性，也没有积累风貌，其简单的理由就是，各种回答的性质是不同的，并不能归结为命题主义。某种问题学的回答拥有这种特殊性，即它能从不可思议中分化出思想来，

能够标志种种交替性，创造某种关系和意义空间，而这正是它带来的解决方法。它不是人们通常理解意义上的某种解决方案：某种非批评性的回答——如同我称谓的那样——关闭调查，拒绝问题性并更多地脱离问题，而非寻找问题、挖掘问题并昭明问题。它作为另一问题的基础，以此类推。各种问题消失了，种种回答积累起来。

须知，哲学以这种尺度来衡量的幻觉明显源于下述事实，即它的问题没有从问题学的角度去感知；由此出现了对科学回答衡量尺度的批评。哲学自古以来就是以非问题学的方式提出它的各种问题的，它没有叩问提问本身，但是转向了某种他处，把自己置于与它以上述方式使其成为可能的科学相竞争的位置。

正是哲学领域可能性回答的多元性揭示了哲学的独特性，而这种多元性是纯粹历史性的。历史性与问题学意义上的亦即根基上的和哲学意义上的提问构成一对姻缘。唯有历史昭示，哲学领域的回答中，存在着各种问题的某种坚持性，尽管其回答的身份，因为它的内容中有不同的成分，尽管内容是由种种回答组成的，然而这种内容是一定会呈现出来的。作为回答的哲理性只能事后确立，只能在被哲学带向它自身历史的视野下确立。如果我们漏掉了历史性所蕴涵的阅读，作为原理的叩问便会被拒绝，而人们就会看不到它的作为。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这样去思考它，就会满目只有叩问的心理学表现或语言学表现，而它的根本的哲学性质，因为它是哲理性的根基，就会与思想本身失之交臂。于是，哲学上相继出现的各种回答就呈现为未经论证的种种命题，并因为它们不可调和性质而呈现为无法论证的种种命题，这种不可调和性使它们相互对立，哪怕是辩证性的对立，如在黑格尔那里。它们是各自分离的个性的自由表达，人们谈论斯皮诺萨（Spinoza）或洛克（Locke），因为人们从他们的哲学里只能看到对一位创造性天才的反映，而并非首先看到某种回答，即有待看作历史性的回答。需要弄清楚的是，这将是我们的第一章的目标，为什么问题学如今变得可能。事实上，在科学的种种虚无主义力量和历史加速的多重冲击下，哲学最终偏离了自己的道路，而不管在哪个时代，它都不可能作出其他反应。历史把所有这些分离力量聚合起来，并尤为明显地呈现出这种原初缺陷，因为这种大漏洞提出了问题。叩问性的真理通过拒绝的某种层面和种种恰当形式而确立，即通过拒绝和表达在智识活动之基础普遍出现的这种叩问性而确立。这就是哲学何以能够长期呈现为互相对立的伟大个性的自